

吳下衣冠盡楚材—— 元代蘇州寓居士人陳基*

許守泯**

摘要

本文以元末寓居蘇州的士人陳基（1314—1370）為研究對象，考察其一生經歷，特別是寓居蘇州期間的政治、社會、文化活動。蘇州在元代是為平江路，元末動亂不安之際，不少士人遠走他鄉以避災禍，蘇州是上選之地。陳基起初並非因避難而寓居蘇州，不過卻因為寓居蘇州，使得陳基經歷蒙元、張吳、朱明三個政權的統治。透過對陳基一生經歷的考察，一方面探討一位寓居士人如何融入當地社會進而有所貢獻；另一方面闡述陳基奉元為正朔的態度，以及選擇支持張吳政權的意義。奉元為正朔與支持張吳政權，也成為陳基不明顯正面支持朱明政權的主因。陳基奉元為正朔，在於承認蒙元政權的正統性，無關異族統治；支持張吳政權，則是在奉元為正朔的前提下，加上張吳政權「保境安民」、「禮下賢士」的角色獲得士人認同。陳基的個案研究，可以提供理解元明之際江南士人對於政權選擇的另一個註解。

關鍵詞：

元代、蘇州、陳基、寓居、張吳政權

* 本文為 94 年度行政院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補助的部分成果。本文並承二位匿名審查人審查，提供寶貴意見，謹此致謝。

**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吳下衣冠盡楚材——元代蘇州寓居士人陳基 / 許守泯*

- 一、前言
 - 二、從政經歷
 - 三、社會參與
 - 四、結論
-

一、前言

元朝是中國歷史上由蒙古遊牧民族所建立的征服王朝，其版圖最爲遼闊、民族最爲繁多。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入主中原、征服南宋之後，蒙古族統治人口眾多的漢族，成爲少數統治者。爲了突顯身爲統治者的優越地位並壓制分化其他被征服民族，蒙古統治者採取「族群等級制」，按族群降附的順序及其政治可靠度，把所有族群分爲「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四等，各賦予不同的身分與權利。其中「南人」指的是原來居住於南宋境內絕大多數的漢族，在籍約五千萬，雖然人口最多，但投降最晚，所以地位最低，待遇最差。

面對這種轉變，原本在漢族政權中享有尊崇政治、社會地位的士人階層，可說受到很大的衝擊。元朝漢族士人階層並不受到蒙古統治者的特別青睞，與士人關係密切的「儒」，則被當作與佛、道一樣的宗教看待。就出仕而言，元廷選用官員主要以「出身」，即所謂與蒙古皇室關係是否深遠的「根腳」背景爲考量，不以個人「成就」爲標準，加上元朝的科舉不能像宋代一樣成爲入仕的重要正常管道，¹士人出仕遭遇困難。雖然元代並無人分十等的制度，但「九儒十

*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¹ 元代的科舉的情況，請參考姚大力，〈元朝科舉制度的行廢及其社會背景〉，《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 6 期，1982，頁 29-59。

丐」之語則能反映士人所受到的待遇。²江南士人既是「南人」又是「士人」，其處境之窘困可想而知。但也因時代環境的「變異」，學者認為更促使士人多方尋求不同於入仕的出路，而將才能發揮在不同場域，這種「角色的擴散」，「為社會新的成長與改變產生更大的潛力」。³

不過即使入仕困難，仍有許多漢族士人積極尋求仕宦的機會。江南士人陳基（1314—1370）就是一個例子。陳基是元代後期一位寓居蘇州多年的台州士人。寓居蘇州以前，他受人推薦入仕元廷；寓居蘇州期間，他接受張吳政權的延攬；朱明政權之初，他參與第一次的《元史》編修。這三次的仕宦經歷對陳基來說各有不同的體驗，並且都和寓居蘇州產生關聯。蘇州通常也慣稱為「吳」，宋元時代是為浙西的行政中心，元代稱為平江路，隸屬江浙行省江南浙西道，含崑山、常熟、吳江、嘉定四州，以及吳、長洲二縣，⁴蘇州成為士人寓居的一個選擇地點，有其背景原因。

首先，在經濟條件上，蘇州是浙西大郡，南宋諺語「天上天堂，地下蘇杭」及「蘇、湖熟，天下足」，說明蘇州在南宋地區經濟發展已經占有重要地位。蘇州不僅田土肥美，天然物產豐富，而且從宋代到元朝，其農業、手工業、工業皆持續成長，與人口的增加互為表裡，促進蘇州地區的城市發展與市鎮興起，成為商業中心，不但許多士大夫達官貴人來此置產，出入經商的流動人口也不少。

其次，交通方面，蘇州位居交通要津，聯繫以水運為主，陸運為輔。運河是蘇州對外的交通幹線，南可至杭州，北經常州、鎮江府；渡長江北行可到汴京，溯長江則西上至建康、鄂州。鄰近的太湖、松江皆可通航，蘇州全境密佈的水道也多具有航行功能，並伸展出境外，在浙西形成一個交通網，方便蘇州

² 參見陳得芝，〈從「九儒十丐」看元代儒士的地位〉，收入氏著《蒙元史研究叢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頁424-429。

³ Frederick W. Mote, "Chinese society under Mongol rule." in Herbert Franke and Denis Twitchett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6, 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 907-136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638-640. 中譯本見史衛民等譯，《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頁728-730。

⁴ 蘇州古為吳國之境，經歷代置郡與疆域分割，唐初為蘇州，又改吳郡。宋為平江府，元代升為平江路，領崑山、常熟、吳江、嘉定四州，以及吳、長洲二縣。不過在稱呼上，一般仍以「吳」慣稱。見明·宋濂等，《元史》（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76），卷14，〈地理五〉，頁1493-1494。

與浙西其他州郡的聯繫。而且蘇州頻海，擁有多處出海口，又可經由海運與明州、泉州、廣州等貿易港以及沿海各地交通，甚至與海外各國往來。陸路交通雖不及水路重要，但是土堤（石路）、木橋（石橋）的修建則是蘇州水鄉的重要聯繫。便利的交通是促進蘇州發展的要件之一。

所謂「舟航往來，北自京國，南達海徼，衣冠之所萃聚，食貨之所叢集，乃江外之一都會」，⁵因此經濟的發達、便利的交通，加上是浙西行政中心，宋元時代的蘇州已經成為商業、財稅、轉運、行旅及人口流動的中心。⁶

又，就文化而言，宋元以來東南沿海一帶商業經濟的繁榮，對城市生活、文士的生活方式和觀念以及士商關係產生影響。在元代，東南一帶富商往往成為文人、藝術家的贊助者，甚至參與者，而由士人創造的文化則呈現肯定自我、重視心性的個性化，以及追求物質生活的世俗化傾向。蘇州具備了這樣的文化特色。⁷

最後，從元代後期局勢來看，順帝妥歡貼睦爾（1320—1370）即位之後，承接元代中期以來政局不穩、政策多變的不安局勢，⁸加上這段時期自然災害頻繁，又有吏治敗壞的雪上加霜，造成社會動盪民不聊生，各地陸續出現明顯而較大規模的變亂。雖然這些變亂並非從順帝即位才開始，但不斷擴大的結果，形成元末群雄並起。⁹當此動亂不安之際，許多士人紛紛遠走他鄉以避災禍，甚至長期居住該地。以江南地區而言，蘇州由於局勢相對其他地方穩定，往往成

⁵ 朱長文（宋），《吳郡圖經續記》（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卷上〈物產〉，頁10。

⁶ 這部分所談宋元蘇州的發展，根據梁庚堯，〈宋元時代的蘇州〉，收入氏著《宋代社會經濟史論集》（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上），頁334-480。另可參考 Michael Marmé, "Haven on Earth: The Rise of Suzhou, 1127-1550." in Linda Cooke Johnson ed. *Cities of Jiangna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pp.17-30. 中譯本見成一農譯，《帝國晚期的江南城市》（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頁21-39。

⁷ 蘇州文化特色，見王忠閣，《元末吳中詩派論考》（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頁26-46。又見陳建華，《中國江浙地區十四世紀至十七世紀社會意識與文學》（上海，學林出版社，1992），頁16-35、72-85。王忠閣提到商業繁榮的因素之外，佛道盛行、理學思想的心性傾向，同時促成這一文化特色。陳建華所言元末江浙文學世俗化與個性化的特徵，主要地區也是東南沿海一帶。

⁸ 元代中期政治的發展，參閱蕭啟慶師，"Mid-Yuan Politics." in Herbert Franke and Denis Twitchett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6, *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 907-1368.*, pp.490-560. 中譯本見《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頁563-671。

⁹ 元代中後期的叛亂與發展過程，參閱周良霄，《元代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頁611-688。

爲士人走避的選擇，同時，由於元代士人長期對政治的疏離，再加上充裕經濟環境的支撐，蘇州遂成爲元末隱逸風氣盛行之地。¹⁰

在上述背景條件下，蘇州成爲流寓士人的上選之一。

元代士人流寓蘇州的現象並非因爲後期的戰亂才開始出現。而且有元一代，寓居蘇州的士人，更爲當地的人文發展增添豐富內涵。例如，藝術方面，淮陰龔開（1222—1237）、湖州趙孟頫（1254—1322）、仙居柯九思（1290—1343）、無錫倪瓚（1301—1374）等人；學術文學方面，浦江柳貫（1270—1342）、金華吳萊（1297—1340）、遂昌鄭元祐（1292—1364）、諸暨楊維禎（1296—1370）、蘭武謝應芳（1296—1392）、鄱陽周伯琦（1298—1369）、金華王禕（1322—1373）等人。¹¹可以說，這種社會流動對於蘇州造成影響，即寓居士人對當地之學術文化的參與和貢獻。¹²

陳基居蘇州多年，但他起初並非因避難而寓居該地。從時間來看，陳基在蘇州可分成張士誠（1321—1367）入吳前後兩段時期；從政權上區分，陳基經歷蒙元、張吳、朱明的統治，看似多重的政權選擇。而關於元明之際士人的政治態度，學者多有討論。例如，錢穆解析明初開國諸臣的詩文，指出諸臣仍心繫元朝，實拘君臣小節而昧於民族大義，缺乏夷夏之防。¹³美國學者竇德士（John W. Dardess）、林麗月、劉祥光各以江南漢族士人之群體及個人爲對象，分別從「儒士的專業實踐」與「道學的仕隱觀」兩種角度，討論元明之際士人的出處，基本上其研究皆顯示士人對鼎革之際的政權選擇，與「夷夏之防」或「君臣大義」並無太大關聯，重點在於是否能實踐士人的「專業」或「合於道」。¹⁴

¹⁰ 見王忠閣文。

¹¹ 這幾位蘇州寓居士人主要根據，清·李銘皖等修、馮桂芬等纂，《蘇州府志》（光緒九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卷110，〈流寓〉。

¹² 關於這點，本人擬另文討論。

¹³ 參閱錢穆，〈讀明初開國諸臣詩文集〉、〈讀明初開國諸臣詩文集續篇〉，收入氏著《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六）（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5），頁77-171、172-200；又見勞延煊，〈元明之際詩中的評論〉一文補充，收入《陶希聖先生八秩榮慶論文集》（台北：食貨出版社，1979），頁145-163。

¹⁴ 竇德士以元末浙東諸儒及其專業實踐爲討論主題，見 John W. Dardess, *Confucianism and Autocracy: Professional Elite in the Founding of the Ming Dynas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p.9-10. 林麗月以吉安陳謨、劉祥光以徽州鄭玉，以道學的仕隱觀討論士人之出處，見林麗月，〈讀《海桑集》——論元明之際陳謨（1305-1400）的出處及其後

蕭啓慶師則擴大族群範圍的研究，指出元代的蒙古、色目遺民皆出於士大夫階層，思想上所受「君臣大義」的影響大於「夷夏之辨」，¹⁵但焦點集中在遺民，無法顯示蒙古、色目士大夫對鼎革的其他反應，因此另文以元朝進士為中心，探討各族進士在元明之際的政治態度，分別有「殉國盡忠」、「北歸外奔」、「退為逸民」、「出仕群雄」、「仕明貳臣」、「守節遺民」等多元抉擇，並反映出元明易代士人決定出處的因素在於「君臣大義」而不是「夷夏之辨」的一般趨勢。¹⁶

「多重政權選擇」，是本文選擇陳基為研究對象的主要因素之一。從區域來看，元末群雄割據之時，浙西士人支持張士誠現象甚為明顯。這點與竇德士研究的浙東士人支持朱元璋不同。學者認為張士誠出身非紅巾系統，且其「禮下文士」表示他對一切傳統文化的重視，又能在蘇州提供一個政治、文化、經濟、社會相對穩定與發展的環境，符合某些江南士人「保境安民」的期望。此外，與朱元璋或其他起事者相比，張士誠與元朝合作的程度較高。所以得到浙西士人的支持。¹⁷士人個人支持張吳政權的理由或各有異，但「奉元朝為正朔」及「禮下文士、保境安民」應為共同基調。寓居蘇州的陳基也是如此。

因此，本文以陳基為研究對象，一方面考察其從政經歷，分析其政權選擇以及對蒙元、張吳、朱明政權的態度；另一方面從寓居士人的角度，探討陳基如何與當地社會建立聯繫，產生互動。這兩方面實際上仍與「奉元正朔」、「保境安民」的基調相關。希望藉此個案研究，在既有的研究成果之上，為理解元明之際士人的政權選擇提供另一個註腳。

世評價》，收入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主編，《世變、群體與個人——第一屆全國歷史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1996），頁 148-166。劉祥光，〈從徽州文人的隱與仕看元末明初的忠節與隱逸〉，《大陸雜誌》94 卷 1 期，1997，頁 32-48。

¹⁵ 蕭啓慶，〈元明之際的蒙古色目遺民〉，收入氏著《元朝史新論》（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頁 119-154。

¹⁶ 蕭啓慶，〈元明之際士人的多元政治抉擇——以各族進士為中心〉，《台大歷史學報》第 32 期，2003，頁 77-138。

¹⁷ 見鄭克晟，〈試論元末明初江南士人之境遇〉，收入氏著《明清史探實》（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頁 7-33；王忠閣，〈元末吳中詩派論考〉，頁 23-29；汪柏年，〈元明之際江南的隱逸士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1996，頁 37-54。

二、從政經歷

陳基一生經歷，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首先是遊學杭州到任職朝廷的期間，其次是寓居蘇州到淮張入吳以前的歲月，接著經歷張吳政權統治，最後是入明短短數年的時光。

（一）憶昔相從客燕趙——遊大都

陳基，字敬初，號韋羌山人、夷白道人、夷白居士、夷白子。台州臨海人。九歲喪父，十四歲與兄陳聚奉母姜氏之命從師於杭州。十八歲受業於金華黃潛（1277—1357）。黃潛是元代延祐二年（1315）首科進士，至正元年（1341）授江浙儒學提舉，該年前後收陳基為徒。¹⁸至正初，陳基與另一門生王禕，從黃潛遊京師，陳基遂獲經筵檢討一職，但是後來因上諫順帝「並后」之失，得罪順帝，只得退隱避居。¹⁹

所謂「並后」事件，指順帝立高麗奇氏完者忽都為后一事，時間最遲應在至正八年以前。據《元史》〈順帝本紀〉至正八年條載，監察御史李泌以「世祖誓不與高麗共事」的理由指出立奇氏為后之不妥，但不為順帝接受。²⁰所以立后一事並非僅陳基反對。但陳基以經筵檢討之職，並無資格如監察御史李泌一樣向順帝諫言。事實上他是幫人起草諫章，²¹內容即陳「並后為致亂之本」，但也

¹⁸ 徐永明，〈黃潛年譜〉，收入氏著《元代至明初婺州作家群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下編·考證篇〉，「元順帝至正元年」條，頁237。黃潛事蹟見《元史》卷181，〈黃潛〉，頁4187。

¹⁹ 尤義（元），〈陳基傳〉，收入陳基，《夷白齋藁·附錄》（四部叢刊本），頁1a。陳基究竟於何時與黃潛同往大都，根據尤義〈陳基傳〉所述，是至正元年（1341）。但徐永明所編〈黃潛年譜〉與〈王禕年譜〉中的考證，王禕和陳基是在至正六年（1346）冬隨黃潛到大都。尤義的至正元年之說應為誤，因為至正元年黃潛授江浙儒學提舉，才剛從京師補外，該年收陳基為徒，不可能馬上又遊大都。而至正六年黃潛恩授翰林直學士，再度入京，並攜王禕、陳基同行。因此「六」年或為「元」年之誤。見徐永明，〈黃潛年譜〉，「元順帝至正元年」條，頁237；〈王禕年譜〉，「元順帝至正六年」條，頁524-526。〈王禕年譜〉亦收入《元代至明初婺州作家群研究》。

²⁰ 《元史》卷41，〈順帝本紀第四十一〉，頁883。

²¹ 陳基幫忙起草的人是他的學生，但無法確定是否為李泌。〈陳基傳〉載「其徒有為御史者，以言責諍於基」。

因此受到順帝怪罪，只好引疾而歸。

對於這段出仕到退隱的經過，陳基有詩曰：

……御史不容丞相忌，司隸側目宮臣讒。脫身黨籍走吳楚，託跡丘園求孔聃。孰令展禽三見黜，自分嵇康七不堪。……²²

又曾說：

承平盛年，余嘗三至京師，覬得微祿以為親養。間用薦者入朝，同進見忌，尋引避還江南。²³

由此可見，陳基曾三度至大都謀官，理由之一是爲了養親，但皆鎩羽而歸。至正初，先出仕，後退隱。究其原因，除了得罪順帝，似乎也受到官員的排擠，不容於朝廷。出仕不利，陳基以春秋時代魯國展禽（即柳下惠）出任士師卻三黜自比，並體會到曹魏時代嵇康（223—262）所說爲官「七不堪」。²⁴至於三度進京的時間，可以確定的一次就是至正初年隨黃潛遊大都獲得經筵檢討之職。另外兩次應在他引還江南，寓居蘇州，直到張士誠入吳（至正十六年）之前這段期間當中。²⁵

陳基的同門戴良（1317—1383），日後爲他編纂詩文集《夷白齋藁》，序言提到：

（陳基）游吳中，久之，又自吳踰淮，泝黃河而北達于燕趙，留輦轂之下，久之。于時雖未有所遇，然自京師及四方之士不問識與不識，見其文者莫不稱美之不置，則其得之黃公者深矣！²⁶……

換言之，陳基居吳地之後，仍然抱持謀官的希望北上大都，只不過雖享有文名卻「未有所遇」。

陳基遊大都的目的，一來爲求官職，二來大都不但是政治中心，也是天下

²² 陳基·〈謝從義參軍自京師還言中書危參政見問且訝無書因述詩寄謝〉，《夷白齋藁》卷5，頁4a。以下凡爲陳基所撰之文，省略陳基二字。

²³ 〈三咲軒記〉，《夷白齋藁》卷29，頁1a。

²⁴ 「展禽三黜」見《論語》〈衛子〉。嵇康在〈與山巨源絕交書〉中提到爲官「七不堪」，主要都是指因爲當官受到各種束縛而不得自由。

²⁵ 陳基在大都任官以及後來兩次北上求官，前後陸續約有八、九時間，其〈送王本初縣尹兼簡本中知州〉，有詩云「憶昔至正初，北游客京師，……俯仰八九載，南歸滄海涯」。《夷白齋藁·外集》，頁5a。

²⁶ 元·戴良，《夷白齋藁·目錄》，頁22b-23a。

英才薈萃之地，一遊大都有機會與各方英才交流，既能自我推薦，亦可增廣見聞。結合求仕與增廣見聞的目的，即元代遊士之風。元代遊士風氣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由於漢族士人（尤其是南人）入仕不易，依靠權貴提拔推薦遂為重要途徑，大都自然是士人向權貴毛遂自薦的最佳所在。其次，蒙元政權結束唐末以來中國長期的南北分裂，使得南方文士有機會北遊以增廣見聞。²⁷

對陳基而言，大都是士人幾經遊歷之後的「終極目標」。他表示：

人之厭江湖者則思山林，厭山林者則思城郭，居城郭者則思游乎通邑名都，以日充其所見聞。譬猶魚之處池沼則慕湖陂，處湖陂則慕江海，處江海則又欲脫鱗鬣、生羽翰，絕雲蜺、負青冥，以達乎天池而止焉。京師，士大夫之天池也。²⁸

如同魚經歷池沼、湖陂、江海不同環境的蛻變，到達天池已脫胎換骨，另有一番境界。士人的歷練亦然，而大都正是士人的天池。因此陳基的大都遊，不僅是人生中的重要經歷，入朝任官更是榮耀的印記。陳基在大都結識不少達官士人，例如登揭傒斯（1274—1344）之門，並與其子揭沄（1304—1373）交遊；其他與危素（1303—1372）、楊鑄、鄒魯望、張仲宣等人亦有交往。這群士人中，揭傒斯輩分最高，於仁宗朝入仕，順帝朝歷翰林待制、集賢直學士、翰林侍講學士等職，其他人亦「相繼登臺閣」，²⁹危素和鄒魯望與陳基一樣皆任經筵檢討，揭沄蔭補秘書郎，後遷翰林編修等職。當陳基入仕時，有著「叨逢堯舜時，拔擢登明堂。佩以明月珠，被之雲錦章」的喜悅與榮耀。³⁰無怪乎陳基退隱蘇州之後，仍二度北上，可見大都魅力之所在，而陳基對大都的嚮往，也可作為當時大部分士人的心情寫照。

²⁷ 參考丁崑健，〈從仕宦途徑看元代的遊士之風〉，收入蕭啟慶編，《蒙元的歷史與文化》（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1）（下），頁 635-653。

²⁸ 〈送陳希文北上序〉，《夷白齋藁》卷 19，頁 3a。

²⁹ 〈送鄭同夫歸豫章分題詩序〉，《夷白齋藁》卷 14，頁 1b。

³⁰ 〈發大都〉，《夷白齋藁·外集》，頁 1b。

（二）自笑久為吳下客——寓蘇州

陳基的五世祖由溫州永嘉遷至台州臨海。臨海位處偏遠貧瘠之地，但是民風知書達禮。陳基說：

予鄉去城百五十里而遠。大率深山長谷，土田之利薄。歲所入自供公上之外，僅足以給衣食。以故，民無贏餘，而得盡力於畎畝。暇日，鄉之老者率其子弟相與誦詩讀書，而其人皆知講說周公、孔子以相尚。³¹

所以陳基常自謂「少以賤貧走四方」，十四歲離開故鄉北上杭州尋求發展因而認識黃潛，進一步到大都謀職，南歸之後寓居吳地，並迎其母前來奉養，名其室為「白雲山房」。³²

長期寓居蘇州，陳基已經成為在地人。他自述：

予少以貧賤役四方，久居于吳，婚娶于吳，育子女于吳，衣帛食稻于吳，母沒葬于吳之壤，僕妾廝養皆吳人，盡室皆吳語，而予獨操越音于其間。……四方之人遂皆以吳人目之，而予老且仕不出吳境，吾自視亦吳人而已乎！³³

所有生活一切均與吳地相關，也難怪陳基自認為吳人。但是，一方面陳基並不忘本，他蓋了名為「小丹丘」的小屋，「丹丘」乃天台山別名，有「昔人不忘其土」之意；另一方面，陳基卻又不認為「知其所出」是很重要的事：

予五世祖家臨海，而五世之上不必知也；予今居吳，而後於予者，亦不必其知也，凡人五世而親盡，親盡則塗人而已。³⁴

這可能是因為在亂世中的流寓者不能確保回歸故里或在他鄉長居久安，所以不特意將蘇州當成生根發展之地，也認為後世子孫無須知道他曾經居住此地。不過對於從故鄉前來投靠的陳氏宗族，陳基卻能夠提拔照顧：

宗族故舊自浙東來依，率養育獎勸，俾各有成。士有才可用，必引而進之。有喪不能舉者，為買棺歛，恩意過於平生。³⁵

³¹ 〈雙谿詩序〉，《夷白齋藁·外集》，頁 25a-25b。

³² 〈飛雲樓詩〉，《夷白齋藁》卷 22，頁 4a。

³³ 〈小丹丘記〉，《夷白齋藁·補遺》，頁 35a。

³⁴ 同上，頁 35a-35b。

³⁵ 尤義（元），〈陳基傳〉，頁 2a。

宗族故舊來依，應該與陳基後來出仕張士誠政權有些關聯，畢竟他是宗族中的仕宦者，因此有義務責任關照這些宗族故舊。

在生計上，陳基於蘇州以教授諸生為生。雖然陳基仕元宦途不甚順遂，但文名愈高。上文提及戴良陳述陳基的文章在大都受到士人稱許的情形，或許這是戴良對同門多了幾分的讚美，但戴良亦有其看法。

戴良認為：元朝自世祖忽必烈以來五、六十年，已如同漢、唐、宋般的盛世，其時士人莫不歌詠太平，又以蜀郡虞集（1272—1348）、豫章揭傒斯、金華黃潛、柳貫（1270—1342）並稱文章大家。繼之而起者，有莆田陳旅（1287—1342）、新安程文（1289—1359）、臨川危素（1303—1372）等。陳基既為黃潛門生，深得其傳，又與虞、揭、柳等人亦師亦友，因此文章造詣益發精進，堪稱與諸公相當，陳、程、危三人之後當以陳基為第一。³⁶而陳基教授學生，「為詞必務上法三代，下軼漢唐」，於是「東南聲文為之丕變」，遠近學者莫不前來就教。³⁷陳基教授吳地諸生一方面更能拓展名聲，一方面對物質生活也有所幫助。

到張士誠入吳以前，寓居蘇州這段期間，應是陳基一生中最悠然自得的時光。

（三）一官迢遞客天涯——仕張吳

陳基寓居蘇州的安寧日子，因持續擴大的亂事而產生變化。

元後期順帝朝叛亂四起，「變鈔」、「開河」實為導火線，引爆出蒙元政權統治以來制度不公、吏治腐化、軍政敗壞、財用枯竭等諸多問題造成的政治社會危機。「變鈔」與「開河」是順帝丞相脫脫之舉措。至正十年（1350）五月，為了處理財政危機，脫脫接受吏部尚書偃哲篤建議，又一次改行鈔法，結果卻是通貨膨脹、物價上漲，使得原已存在的社會不安雪上加霜。這是「變鈔」。至於「開河」，則是要解決黃河氾濫潰堤的災患，脫脫採納賈魯的意見整治黃河。至正十一年四月開始這項歷時八個月的大規模河防工程。最後工程本身雖然成功，但治河過程中所引起的民怨遂為有心者所利用，以韓山童為首的白蓮教就

³⁶ 戴良（元），《夷白齋藁·目錄》，頁 22a-23a。

³⁷ 尤義（元），〈陳基傳〉，頁 1a。

是在這種情況下起事。當時民間流行的小令《醉太平》就說「堂堂大元，奸佞專權，開河、變鈔禍根源，惹紅巾萬千」。³⁸

韓山童起事之後，各地反叛層出不窮。其中張士誠於泰州發難，至正十四年（1354）正月建國號「大周」，自稱「誠王」，並占據高郵，控制大運河，阻斷南北交通，對元廷構成莫大威脅。因此，為打通南北大運河的交通命脈，同年九月，丞相脫脫率大軍親征張士誠。十一月，圍高郵，高郵城岌岌可危。但卻在同時，脫脫受政敵趁機在朝廷詆毀構陷，導致兵權臨時被奪，進兵高郵功虧一簣，張士誠死裡逃生。接著，張士誠放棄其政權建立根據地淮東，渡江南下，轉進富庶的浙西。

至正十五年底，張士誠先遣其弟張士德（1322—1357）渡過長江，十六年進據平江，改為隆平府。三月，士誠自高郵來，定官制，以士德為平章。士德為士誠三弟，隨士誠起兵以來建功最多，江南浙西諸地皆其所略定。士德為人善戰有謀，能得士心，入主吳地之後「念吳民多艱」，又當地原來官員「多非才」，遂重新選拔人才作為替代，曾在一日之內更換十一位地方官。且士德：

尤好文學士，入吳延辟無虛日，網羅一時俊傑，如王逢（1319—1388）、陳基，俱召致幕中。³⁹

有關陳基的資料，皆載張士誠入吳之後重用陳基，學者將他歸類於支持張吳政權的士人。鄭克晟認為，張士誠雖出身鹽販，但他能籠絡士人，因此受到支持。相對的，士人對張士誠亦有相當的期望，希望他能做到「兵不嗜殺」、「聞善則拜」、「儉於自奉」、「厚給吏祿而奸貪必誅」。元末浙西之所以相當多士人擁護或參加張士誠政權，共同原因在此。⁴⁰陳基也是其中之一。當時與陳基一樣接受張吳政權延攬的知名士人，例如饒介、鄭元祐、魯淵（至正十一年進士）、錢用壬（至正十四年進士）、周伯琦、蘇昌齡等。其中饒介的門人張憲、楊基也出仕張吳。另有不接受延攬，保持若即若離關係者，例如楊維禎、王逢（1319—1388）。⁴¹

³⁸ 陶宗儀（元），《南村輟耕錄》（元明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 23，〈醉太平小令〉，頁 283。

³⁹ 支偉成、任致遠，《吳王張士誠載記》（上海：大中書局，1932）卷 3，頁 3a-3b。

⁴⁰ 鄭克晟，〈試論元末明初江南士人之境遇〉，頁 20-23。

⁴¹ 參考廖懿姿，《元末張士誠政權與淮東、浙西社會》（國立清華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2003），

基本上，將陳基置此於「張士誠禮下賢士」與「士人對張士誠有所期待」的脈絡下解釋他之所以支持張吳政權，當屬合理。不過，從個人理由的角度，還可以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陳基選擇入幕張吳之因，無法從現有資料中獲得明確的答案，但推測可能有下列考量。首先，張士德初入平江，體恤民艱與善待士人的態度皆獲陳基的認同，其「好下賢士，創造霸業」，更使得當時一千文士「頌慕之詞久而不替」，⁴²像王逢「於士德尤惓惓」。這種現象即使士德死後亦然。換言之，陳基支持張吳政權，一開始應是因士德之故。

其次是生計負擔。年輕時代的陳基「少以貧賤役四方」，遊大都既謀出仕更為謀生。寓居蘇州之後以教書為生，生活是否寬裕不得而知。然其詩文顯露因生活而必須出仕的無奈。陳基仕張吳之後寫給其姪陳讓之詩云：

吾女咿嚶學言語，汝兒讀書知姓名。中年竊祿正為此，使有石田歸力耕。

43

這段詩提到女兒年幼所以「中年竊祿」，至少表面看來生計因素確實是出仕理由。此外，陳基對自台州來依的宗族又負有「養育獎勸」之責，尤其出仕之後來依的族人更多，必然有一定的經濟負擔。陳基似乎頗為富裕，因為離亂之際，他曾把「白金百兩」託付友人尤義保管。⁴⁴不過就整體而言，陳基的生活算是簡樸，張士誠許多僚屬「強占民廬」，唯獨陳基以自己的薪俸買舊宅整修居住，素以「廉謹」為人所稱道。⁴⁵

因此，張士德「好下賢士」的態度、個人的生計責任負擔，以及一向期望出仕的心情等因素，促使陳基接受張吳政權。只是陳基曾出仕元朝，畢竟是元朝臣屬，如今接受張吳政權，必然涉及對於「忠」的選擇。不過從陳基出仕張吳到張士誠降元時間不到一年，這段期間並無直接資料可進一步討論。「所幸」張士誠於至正十七（1357）年即降元，名義上成為元朝體制的一部分，這或許化解了原本應該存在於陳基與「忠」之間的緊張性與矛盾性。

頁 88-98。

⁴² 錢謙益（明），〈周張士誠〉，《國初群雄事略》（明代傳記叢刊，台北：明文書局，1991）卷 6，頁 160。

⁴³ 〈送讓還吳〉，《夷白齋藁》卷 5，頁 3b。

⁴⁴ 張昶（明），《吳中人物志》（明隆慶刻本影印，續修四庫全書）卷 4，〈薦舉〉，頁 7a。

⁴⁵ 尤義（元），〈陳基傳〉，頁 2a。支偉成、任致遠，《吳王張士誠載記》卷 3，頁 14b。

張士誠降元原本就是權宜之計。因為至正十五年（1355）渡江之後，雖順利攻下平江、湖州之地，但接下來對楊完者（嘉興苗軍）、朱元璋，方國珍的幾場戰役連連敗仗，加上大將張士德於至正十七年七月為朱元璋陣營所擒，張陣營士氣大挫。於是在士德建議下，張士誠八月降元，元廷遂授以太尉之職，但是「城池、府庫、甲兵、錢穀，皆自據如故」，再改隆平府為平江路。⁴⁶

張士誠降元之後，對待士人的態度與其弟相似，「好招延賓客，所贈遺輿馬、居室、什器甚具」。例如，元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周伯琦奉命招諭平江，士誠降元後，留周於吳，拜江浙行省左丞，更為周伯琦造第宅、厚廩給，是以「伯琦日與諸文士以文墨流連，因亦忘歸」。所以張士誠的好士作風，使「僑寓貧無籍者」趨之若鶩。⁴⁷

陳基一開始即受張士德延攬，並非趨之若鶩之輩。他對士誠、士德兩兄弟亦各有肯定之處。張士德為朱元璋陣營擒後絕食身亡，陳基作〈祭故平章榮祿張公文〉，曰：

……然公能以貴下賤，而不能屈身以從賊；能以仁伐不仁，而不能臨難而辱國；能厲聲罵賊，而不能與之俱生；能視死如歸，而不能食不義之食。蓋公之生也，民有父母，國有股肱；公之死也，豪傑失倚賴，君子失依憑。……⁴⁸

張士誠降元，士德授為淮南平章政事，但當時他已被俘，元廷遂改以另一弟士信為平章政事，追封士德為楚國公。士德之亡對張士誠而言，不僅犧牲一名兄弟，同時也失去一員大將，而對士人來說，更是失所依憑。士德能在入平江之後短短不到兩年就受到士人如此敬重，可知確有可取之處。

至於張士誠的好士之風同樣受到陳基的肯定。士誠降元之後延攬原為士德召致的士人入幕，「妙簡屬僚」，氣象煥然一新。陳基稱曰：

太尉以武濟時，以文經國。不愛玉帛、輿馬，招來（徠）賢俊，四方奇

⁴⁶ 張士誠入浙西之後的戰役，見廖懿姿，《元末張士誠政權與淮東、浙西社會》，頁 47-51。張士德當時被擒，「問道貽士誠書，俾降元」。可見一直到最後，張士德仍為張士誠定策。見清·張廷玉等，《明史》（點校本，台北：鼎文書局，1982）卷 123，〈張士誠〉，頁 3693。

⁴⁷ 《明史》卷 123，〈張士誠〉，頁 3694；明·錢謙益，〈周張士誠〉，《國初群雄事略》卷 6，頁 163。

⁴⁸ 〈祭故平章榮祿張公文〉，《夷白齋藁》卷 35，頁 1b。

拔之士，聞風而至者相望也，列辟屬僚。……⁴⁹

「以武濟時，以文經國」應置於元朝體制之下來論。前者指士誠降元增添元朝武力，協助平服其他「叛賊」；後者則指張士誠能善用士人，治理吳地。陳基之外，當時其他士人如楊維禎、王逢等皆賦詩頌讚張士誠。⁵⁰

可惜這種氣象未能持續。當時張士誠所據有的郡縣，南至紹興，與方國珍接境，北連通、泰、高郵、淮安、徐、宿、濠、泗之地，至北達濟寧，與山東相距；而浙西之地更是民物蕃盛殷富，大可有一番作為。但張士誠是個「似有氣量，實無遠圖」之人，時日既久，張氏兄弟逐漸驕侈淫佚，懈於政事。⁵¹而另一方面，張吳政權與朱元璋仍時有抗衡，爭戰不斷；此外又與元朝江浙行省的官員將領進行鬥爭，先是聯合江浙行省左丞相達識帖睦爾，排除掌控嘉興、杭州的苗軍領袖楊完者，據有杭州，然後更進一步控制達識帖睦爾。⁵²

在這種情況下，陳基出仕張吳政權的心情逐漸有所變化。一般認為陳基支持張吳政權，受到張氏兄弟重用而飛黃騰達，鮮少進一步論及其出仕心態的轉變，這種轉變則與戰亂有關。連年的戰亂導致漂泊不定的軍旅生涯，在在讓陳基覺得不安。

陳基在張吳政權之下，官至江浙行省郎中（從五品）。至正二十年（1360）、二十二年，陳基隨張士信出鎮杭州、淮安。在這過程中，他深深體會戰亂的流離顛沛。尤其在淮安地區，作〈如皋縣〉詩，其中提到：

伊昔淮海陬，土俗勤稼穡。漚渚盡棄麻，閭閻皆貨殖。

及茲值兵燹，道路紛荊棘。十室九逃亡，一顧三嘆息。⁵³

原來富庶的城鎮因戰亂而繁榮不再，荒蕪淒涼。另外，百姓遭逢經年累月的戰爭，家破人亡的悲劇到處可見，〈述老嫗語〉詩云：

歲暮涉淮海，不辭行路難。從軍豈不樂，即事每長嘆。

老嫗八十餘，日晡未早餐。自云遭亂離，零落途路間。

豈無子與孫，充軍皆不還。男戰陷賊壘，孫存隔河山。

⁴⁹ 〈宋周信夫序〉，《夷白齋藁》卷21，頁3b。

⁵⁰ 錢謙益（明），〈周張士誠〉，《國初群雄事略》卷6，頁164。

⁵¹ 錢謙益（明），〈周張士誠〉，《國初群雄事略》卷7，頁184。

⁵² 廖懿姿，《元末張士誠政權與淮東、浙西社會》，頁51-55。

⁵³ 〈如皋縣〉，《夷白齋藁》卷3，頁2a-2b。

數月無消息，安能顧飢寒。語畢雙淚垂，使我心悲酸。
上天未悔禍，豺虎方構患。近聞山東變，世路復多端。
悠悠顛沛人，何時即平安？⁵⁴

行軍淮安途中所見到景象、人事如此不堪，難怪陳基心酸感嘆。至於陳基個人，軍事行動的四處遷徙使他倍感徬徨。他說：

昔年戍浙今移楚，新歲趨吳復使杭。南北此身皆客計，東西何處是吾鄉？

⁵⁵

此時陳基已入中年，自嘲「少壯不解武，衰老卻從軍」，⁵⁶勞苦奔波的軍旅生活並非他所能適應。另外，張吳政權的變質恐怕令陳基更為失望，變質的原因可分兩方面來談。

首先是張氏兄弟的用人。前面提及張士誠據吳日久逐漸奢縱，且怠於政事，又重用幼弟張士信及女婿潘元紹。士誠諸弟中，以士德最優，士信則評價很差：

士信愚妄，不識大體，人頗嗤之。⁵⁷

素驕奢，不能撫循將士，……一切省憲臣屬輒斥而奴之。……及士信用事，疏間舊將，奪其兵柄，由是上下猜疑，不肯用命。……⁵⁸

士信、元紹尤好聚斂，金玉珍寶及古法書名畫，無不充物。⁵⁹

不過士信的可取之處，在於能招攬「技士」與「文士」，因此陳基等皆為所用。乍看之下，士信似與士德一樣好士而受到文士支持。但事實上，張士信需要文士卻不敬重文士。茲以倪瓚為例。

倪瓚，無錫人，他與黃公望（1269—1354）、吳鎮（1280—1354）、王蒙（1308—1385）並稱為元代四大畫家。由於家境富饒，因此居家讀書，不問世事。個性孤傲高邁，有潔癖，不屑與俗人往來。元末因江南動亂，倪瓚放棄田產家業，輾轉流浪於太湖流域之間。張士信仰慕倪瓚之名，想延攬他入幕，但三度被倪瓚以疾病為由拒絕；又曾求畫，亦遭拒。張士信遂懷恨在心。某日，張士信與

⁵⁴ 〈述老嫗語〉，《夷白齋藁》卷3，頁4b-5a。

⁵⁵ 〈三月二十五日由吳門使杭〉，《夷白齋藁》卷10，頁4b。

⁵⁶ 〈發吳門〉，《夷白齋藁》卷3，頁1a。

⁵⁷ 錢謙益（明），〈周張士誠〉，《國初群雄事略》卷7，頁183。

⁵⁸ 支偉成、任致遠，《吳王張士誠載記》卷3，頁4a。

⁵⁹ 《明史》卷123，〈張士誠〉，頁3694。

眾文士遊太湖，聞蘆葦中有異香，認為「必有異人」。尋訪之下正是倪瓚。張士信一見大怒，命左右大肆鞭打倪瓚。當時一旁文士看得心驚膽戰，倪瓚則閉目不吐一語。事後，又令人刺船，倪瓚撐篙而篙墮水，士信則哈哈大笑。⁶⁰

由此可知，張士信並非真誠禮遇文士，遇到倪瓚這樣不肯屈從的人，則以相當粗暴的方式羞辱之。陳基是否為同遊太湖的文士之一，不得而知，但他與倪瓚為舊識，⁶¹想必不會認同張士信這種蠻橫的行為。不過，張士信對陳基算是敬重，例如出鎮杭州時，陳基建議重修岳飛墳塋、補刻西湖書院書籍，張士信都能採納。⁶²

至於張士誠，其禮下文士固然受到士人的稱讚與支持，但他以好士邀譽，結果卻是：

士有至者，不問賢不肖，輒重贈遺，……。士之嗜利者，多往趨之。⁶³
因此造成所用之士良莠不齊而用人不當，此即楊維禎批評張士誠「信佞為忠」、「信詐為直」、「信貪虐為廉良」，於是「闇於斷制，權為文吏所竊」。⁶⁴

其次是張士誠自立吳王一事。張士誠降元是權宜之計，目的在於保有自己的勢力，然後逐步排除異己。至正十八年（1358），張士誠除去苗軍將領楊完者據有杭州，元廷授張士信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張氏兄弟大權在握。此後江浙行省左丞相達識帖睦爾徒存虛名而已。降元之初，張士誠要求賜封王爵、三公，達識帖睦爾不許。至正二十三年，張士誠命部屬歌功頌德，繼續要求得王爵之位，但仍未果，於是自立為吳王。

張士誠自立為吳王，群下同聲慶賀，唯獨陳基反對。其反對理由並不清楚，但可推想在陳基的觀念中，張士誠既奉元朝為正朔，其自立為王的行為自然違背元廷旨意，且陳基的勸諫言詞想必非常直接，甚至激烈，因為惹得張士誠要殺他。不過張士誠並未殺掉陳基，不久，反而「超授內史，遷學士院學士，階

⁶⁰ 支偉成、任至遠，《吳王張士誠載記》卷3，頁4a、倪瓚（元），《清閼閣全集》（元代珍本文集彙刊，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70），卷11，頁476、488-495。

⁶¹ 〈送徐仲剛詩序〉，《夷白齋藁》卷16，頁3b。序文中提到：「無錫兩君子，一曰徐君元度，……一曰倪君元鎮，……余皆辱交焉」。倪元鎮即倪瓚。

⁶² 錢謙益（明），〈周張士誠〉，《國初群雄事略》卷7，頁176-177。

⁶³ 錢謙益（明），〈周張士誠〉，《國初群雄事略》卷7，頁184。

⁶⁴ 錢謙益（明），〈周張士誠〉，《國初群雄事略》卷7，頁174、184。

通奉大夫，覃恩二代」。

這可說是張士誠一貫「好士邀譽」的作風，正如張士德敬重陳基一樣，處於這種情況下，陳基似乎不得不繼續留在張吳政權，「飛書、走檄、碑銘、傳記，多出於其手」，令人有「首席幕僚」的印象。不過陳基對此卻是「每以為憂，而未敢以為榮也」。⁶⁵事實上，陳基雖入張吳政權，並非張士誠身邊的主要「謀國」幕僚，主謀國者為王敬夫、葉德新、蔡彥文三人，當地歌謠有「丞相做事業，專用王、蔡、葉」之語，其中葉、蔡二人尤為人所詬病。楊維禎有〈蔡葉行〉詩，譏諷蔡、葉二人，序曰：

刺佞倖臣蔡文、葉德。張氏亡國，由大弟，致此，實由二佞。⁶⁶

陳基雖名「參軍」，實則負責「典文章」，如建議修岳飛墳、重刻書院圖書，或者撰寫書信、檄文、碑銘一類文教、文書性質工作。「主議謀」則是王、葉、蔡。因此陳基對張吳政權的重要決策恐怕影響力不大，雖然某方面受到重用，但並無法真正伸展抱負。有人認為陳基中年得祿，又位居機要，榮喜莫過於此。陳基則以為：

不賢而都好爵，倖而貴者也；無功而享厚祿，苟而富者也；無文武非常之材而處機要，不知恥者也。況非素習而任其事，為濫官；非所能而居其職，為竊位。⁶⁷

這些話的用意，一方面批評張吳政權中尸位素餐之人，一方面也是對自己無法「得志」的回應。這種心情，陳基另有詩曰：

季子裘空弊，班生筆誤投。恨無田二頃，歸老石湖頭。⁶⁸

藉著季路與班超之「志」，他道出自己「裘空弊、筆誤投」的卻又無法歸去的遺憾。出鎮淮安南歸蘇州，準備渡江之時，陳基亦有詩云：

時清不識風波險，世亂方知性命輕。坐擁貂裘待明發，臨流空愧魯連生。

⁶⁵ 尤義（元），〈陳基傳〉，頁 1b。

⁶⁶ 楊維禎（元），〈蔡葉行〉，《楊維禎詩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鐵崖逸編〉卷 2，頁 308。〈蔡葉行〉一文也引用於《國朝群英雄事略》卷七〈周張士誠〉，文中「大弟」則做「太弟」。見 184 頁。

⁶⁷ 〈三咲軒記〉，《夷白齋藁》卷 29，頁 1b-2a。

⁶⁸ 〈送姪讓從軍武安〉，《夷白齋藁》卷 6，頁 5a。

魯仲連以「義不帝秦」留名青史，陳基則有愧魯連生的感嘆，是否影射自己出仕張吳的「不義」，著實耐人尋味。

因此，即使張士誠沒有因陳基反對稱王而殺之，卻超授職位，陳基也只能戰戰兢兢，憂而不榮的擔任職務。

（四）恨無長劍斬鯨魚——入朱明

張士誠自立為王次年（至正二十四年，1364），張士信逼取達識帖睦爾所掌印符，自命為江浙行省左丞相，並將達識帖睦爾遷到嘉興軟禁。事至此，元廷也只好以張士信為行省左丞相。達識帖睦爾不久自盡。同年，朱元璋於金陵即吳王位。當時人稱張士誠為「東吳」，朱元璋為「西吳」。朱元璋滅陳友諒之後，張士誠是下一個目標。之前，朱、張爭戰各有勝負，至正二十四年開始，雙方戰事密集。至正二十六年，朱元璋傳檄姑蘇，數張士誠八大罪狀，正式宣告伐東吳。年底大將徐達（1332—1385）圍平江長達十月。二十七年城破，張士誠被擒至金陵，自縊身亡。⁷⁰

徐達克平江，擄獲張吳政權官屬甚眾：

凡獲其官屬平章李行素、徐義，右丞饒介，參政馬玉麟、謝節，王原恭、董綬、陳恭，同僉高禮，參軍陳基，右丞潘元紹等所部將士，杭、湖、嘉興、松江等府官吏、家屬及外郡流寓之人，凡二十餘萬，并元宗室神保大王、黑漢等皆送建康。⁷¹

擄獲的張吳臣僚「多見誅戮」，例如王、蔡、葉三人受縊殺。面對這種情況，陳基表現出「晏然無所恐」的態度。由於眾人肯定陳基才能及其行事廉謹，朱元璋並未殺陳基。明洪武元年（1368，元至正二十八年）詔修《元史》，次年開局。

⁶⁹ 〈福山港口待潮〉，《夷白齋藁》卷10，頁2a。

⁷⁰ 《明史》卷123，〈張士誠〉，頁3695-3696。有另一種說法是張士誠被擒後因不言、不食，不受衣冠，朱元璋「遂令御士扛於竺橋，御杖四十而死」。見《國初群雄事略》卷8，頁204，引俞本《紀事錄》。

⁷¹ 錢謙益（明），〈周張士誠〉，《國初群雄事略》卷8，頁204-205。

陳基以「遺逸之士」的身分被網羅，參加了第一次修史。⁷²洪武三年（1371），以疾卒於常熟縣河陽里寓所，享年五十六。⁷³

陳基入朱明政權只有短短三年，無從討論他對於新政權的意見。但是直到朱元璋滅張士誠之前，陳基站在元朝正統的立場，稱叛亂群體為「寇」、「賊」、「妖」，朱元璋陣營自然不會例外。如：

至正十五年……六月，淮西寇渡江，攻陷太平。縱兵四劫，潛趣集慶。⁷⁴至正十五年朱元璋率徐達等人強渡長江進取太平路，接下來攻占集慶（南京）。當時朱元璋仍隸屬小明王韓林兒的龍鳳政權，可是這個戰役對他個人勢力的鞏固發展卻非常重要。當時對抗這群「淮西寇」的元將是南臺御史大夫永年。永年即福壽，唐兀人，《元史》有傳。⁷⁵陳基稱他「身先士卒，出萬死不顧一生，且戰且守，賊鋒大剄」，雖然集慶最後還是被「淮西寇」所占據，不過永年仍功不可沒。⁷⁶

又，張士德於至正十六年被朱元璋陣營所擒，拒食身亡。陳基之後有悼念之詩，曰：

一望虞山一悵然，楚公曾此將樓船。閒關百戰捐軀地，慷慨孤忠罵寇年。

⁷⁷

「楚公」指張士誠，「寇」指朱元璋陣營。「慷慨孤忠罵寇年」即陳基〈祭故平章榮祿張公文〉中所言張士德被擒之後「能厲聲罵賊，而不能與之俱生」。

朱元璋定南京之後，沿浙江取浙東諸郡，攻下衢州、婺州、處州等地，至正十九年十二月，更進兵杭州。看在陳基眼中，這是「妖寇犯杭」。所幸達識帖睦爾與張士誠鎮杭，「寇百方攻城不利」，但卻做出「縱兵四掠，燒民廬、發冢墓」的蠻橫行徑。⁷⁸

至正二十二年陳基隨軍鎮淮安，寫下〈淮陰雜詩〉，提到「江左妖氛掃未清，

⁷² 洪武二年李善長〈進元史表〉，提到這次修史，「特詔遺逸之士，欲求議論之公」，所以陳基是以「遺逸之士」參加。

⁷³ 尤義（元），〈陳基傳〉，頁 1b-2a；支偉成、任至遠，《吳王張士誠載記》卷 3，頁 14b。

⁷⁴ 〈南臺御史大夫西夏永年公勳德詩序〉，《夷白齋藁》卷 20，頁 4a。

⁷⁵ 宋濂（明），《元史》卷 144，〈福壽〉，頁 3441-3442。

⁷⁶ 〈南臺御史大夫西夏永年公勳德詩序〉，《夷白齋藁》卷 20，頁 4a。

⁷⁷ 〈舟中看虞山有感〉，《夷白齋藁》卷 10，頁 2b。

⁷⁸ 〈精忠廟碑〉，《夷白齋藁》卷 33，頁 1b。

山東豺虎又縱橫」，⁷⁹「江左」正是指以南京為據點，形成「妖氛」的朱元璋勢力愈來愈大。「山東豺虎又縱橫」則是元大將察罕鐵木兒平山東亂賊有成，卻遭刺殺，山東亂事再起。⁸⁰原本朱元璋憚於察罕帖木兒在山東的軍事力量，不想與之抗衡，不惜遣使通好於察罕帖木兒。元廷也打算利用這個機會比照「張士誠模式」，授朱元璋江西行省平章政事而收編之。但察罕鐵木兒被刺，朱元璋認為天下從此無人，元軍已不足畏，遂拒絕收編，並繼續其霸業，先滅西方陳友諒，再平東邊張士誠。

總之，陳基入明之前，以「賊寇」看待朱元璋陣營的立場非常清楚。張士誠即使割據一方，甚至自立為王，但至少名義上仍然尊元，與朱元璋「賊寇叛亂」的意義大不相同。入明之後，陳基參與編纂《元史》之舉，並不能說明他支持朱明政權。書成之後，朱元璋本欲給官，但陳基以老病辭，於是賜金而歸。

三、社會參與

陳基長年寓居蘇州，幾乎等同於在地人，而且也因為加入張吳政權，與當地社會的關係更為密切。以一個寓居者的身分參與當地社會，最主要還是透過士人之間不同形式的互動而獲得認同。

（一）結客東吳憶盛年——士人互動

陳基寓居蘇州，結識許多地方文士，建立其交遊網絡，透過這個網絡，使陳基能與當地社會有更密切的聯繫。陳基與士人互動的交遊網絡可區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1. 個別文士

個別文士包括蘇州當地士人，以及和陳基一樣的寓居士人。例如，沈右，字仲說，號訥齋，長洲人。天性醇孝，篤學好問，生平隱居讀書。陳基提到在

⁷⁹ 〈淮陰雜詩五首〉，《夷白齋藁》卷9，頁4b。

⁸⁰ 《元史》卷141，〈察罕帖木兒〉，頁3388-3389。

蘇州與沈右的相處，「多君燕處每超然」。⁸¹在眾文士中，沈右是陳基來往較長久及深刻的好友。

鄭元祐，字明德，號尙左生，處州遂昌人，先寓居錢塘，又徙吳縣，悠遊吳中三、四十年。博學能文，頗負盛名。至正十七年（1357）任平江路學教授，只任一年就因疾而去。二十年陞江浙儒學提舉，不久即染疾過世。享年七十二歲。⁸²鄭元祐和陳基一樣都長期寓居蘇州，成為在地的士人，然其文集《僑吳集》仍清楚表達出寓居身分。他在至正十七、二十四年擔任的平江路儒學教授與江浙儒學提舉之職，都是在張吳政權時代所授與的官職，皆因疾病因素而任期非常短暫。沈右、鄭元祐之類的士人，前者不甚具有聲名，亦非地方大族；後者頗享盛名，卻非本地人士。

沈右、鄭元祐二人亦彼此相識。陳基與他們往來，基本上是意氣相投而詩文唱和。這是文士一般的交遊型態。

2. 一般世族

陳基與蘇州的地方世族有所往來：

中吳多舊族，其子孫克世積善之澤。如甫里陸氏者，代不乏人。余所與遊者曰「仲淵」。……⁸³

吳郡金伯祥氏，家故士族而好施予，其以善士稱於鄉。……伯祥居松江笠澤間，力田教子，益務以善世其家……又即其南榮為軒，曰「瞻雲」，……詩凡若干首，為之序者韋羌山人陳基也。⁸⁴

顧君進道，寓書笠澤之上，……進道實吳鉅族，環溪而居，甲第相望。⁸⁵
吳郡袁氏，居長洲之蛟龍浦者，世為衣冠之族，與吾友者曰「可立」，……自卜築吳江之同里，奉母氏居焉，既名其堂曰「思順」，又屬予發其義以

⁸¹ 〈用韻答沈仲說〉，《夷白齋藁》卷9，頁3a。

⁸² 蘇大年（元），〈遂昌先生鄭君墓志銘〉，收入鄭元祐，《僑吳集》（元代珍本文集彙刊，台北：中央國立圖書館，1970），〈附錄〉，頁1a-3a。

⁸³ 〈陸仲淵字序〉，《夷白齋藁》卷14，頁5b。

⁸⁴ 〈瞻雲軒詩序〉，《夷白齋藁》卷20，頁2a-2b。

⁸⁵ 〈雪屋記〉，《夷白齋藁》卷23，頁1a-1b。

記之。……⁸⁶

陳基與這些世族的往來模式，多半是為他們的字號或居處寫序、寫記，且世家大族藏書甚豐，如袁可立「蓄書數千卷，樂與賢大夫士考論前言往行」，⁸⁷應該也是陳基樂於與之交往的原因。

陳基於蘇州教書為生，這些地方世族亦遣子弟從遊於陳基：

吳郡徐君孟達，命其子緬從余游。⁸⁸

余辱與孟達游，而其子緬以余有一日之長，執弟子禮從余。⁸⁹

徐孟達，名元震，他是中吳舊族甫里陸氏之婿，與陳基相交之後，又使自己兒子徐緬從學於陳基。徐元震宴客之處稱「雅會堂」，東軒則是陳基居住的地方，徐元震死後陳基寫有〈故徐君孟達壙銘〉。⁹⁰可以推想陳基和徐氏、陸氏一直保持良好互動，甚至可能長住徐氏家中。

3. 顯貴世族

另外還有一種交往的世家類型。王都中（1278—1341），原籍福州，其父王積翁（1229—1284）仕宋為福建制置使，至元十三年（1276）以全閩八郡圖籍獻於元，授為江西行省參知政事，後擔任國使宣諭日本，遇害於海上。世祖忽必烈憐憫王都中年幼（七歲）喪父，賜平江田八千畝、宅一區，並使南歸；後又追念王積翁功勞，特授王都中平江路總領府治中（十七歲）。王氏遂居蘇州。王都中歷官無數，年老拜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史稱「當世南人以政事之名聞天下，而位登省憲者，惟都中而已」。⁹¹王氏定居蘇州，成為顯赫大族。

陳基與王都中長子王畛交遊頗深。王畛，字季野，曾入備宿衛，恩授成都府判官。陳基稱他「翩翩貴介，顧能折節好學，日與布衣韋帶之士人游」。兩人曾各自北遊，然後會合，再同抵大都。這段共同的經歷，使陳基感到「平生故舊，獨余兩人者相與為休戚」。陳基為其別墅「貞白室」為銘、「飛雲樓」賦詩，

⁸⁶ 〈思順堂記〉，《夷白齋藁》卷 23，頁 4b-5a。

⁸⁷ 同上，頁 5b。

⁸⁸ 〈徐公遠字序〉，《夷白齋藁》卷 14，頁 6a。

⁸⁹ 〈雅會堂東軒記〉，《夷白齋藁》卷 25，頁 3a。

⁹⁰ 〈雅會堂東軒記〉、〈故徐君孟達壙銘〉，《夷白齋藁》卷 25，頁 3a、卷 35，頁 3a-3b。

⁹¹ 《元史》卷 184，〈王都中〉，頁 4229-4232。

也借居其別墅，⁹²可見二人之情誼。另外，王都中五子王昉於後至元五年（1339）北上京師授職，「中吳大夫士，非先公（指王都中）賓客之選，則昆弟（指王氏兄弟）交從之彥，咸爲詩爲文以貺」，陳基當然是其中之一。⁹³至正八年（1348）王昉陞淮東都府宣差，遭誣下獄，泰州知州趙儼爲之平反。這件事在當時蘇州士人之間相當受到注目，鄭元祐寫下〈趙州守平反冤獄記〉，⁹⁴陳基則有〈趙泰州平反冤獄詩序〉。⁹⁵

4. 外族士人

除上述的漢族士人，陳基與定居蘇州的外族士人也有往來。至正十四年，都水庸田使西夏人楊雙泉至吳門任官，其寓第築有「水雲亭」，由江浙中書平章康里明德題匾，刻於亭中。楊雙泉請陳基記下此事。此時陳基似乎在楊雙泉寓所爲客。⁹⁶同年十二月冬，西夏人鄔密位於吳門的寓第有「聽雪齋」，陳基來訪，記下兩人聽雪雅事。陳基稱鄔密「端居肅容，虛心無爲，與造物者游」。⁹⁷

幹勒海壽，字允常，肅慎望族後裔。拜監察御史。至正九年因彈劾受順帝寵信而胡作非爲的殿中侍御史哈麻及其弟雪雪，卻出爲陝西廉訪副使。不久罷官歸去。後來又起用爲浙東廉訪使。⁹⁸陳基與幹勒海壽應於至正七年左右在大都就已認識，迨幹勒海壽擔任浙東廉訪使，因地緣之便，又與陳基在江南會面。兩人相交二十多年。陳基說他們「生同年，學同業，而道同師」，應都是黃潛門下子弟。幹勒海壽去世時，陳基寫有祭文。⁹⁹

另外，之前提到在戰亂之際幫陳基保管白金百兩的尤義，也是外族，元末辟爲樞密掾。¹⁰⁰

⁹² 〈飛雲樓詩并序〉，《夷白齋藁》卷 22，頁 4a。〈貞白室銘〉，卷 12，頁 7b。

⁹³ 〈送王季境詩後序〉，《夷白齋藁》卷 15，頁 1b。

⁹⁴ 鄭元祐（元），〈趙州守平反冤獄記〉，《僑吳集》卷 9，頁 26b-29b。

⁹⁵ 〈趙泰州平反冤獄詩序〉，《夷白齋藁》卷 14，頁 2a-2b。

⁹⁶ 〈水雲亭記〉，《夷白齋藁》卷 27，頁 2a-2b。

⁹⁷ 〈聽雪齋記〉，《夷白齋藁》卷 28，頁 1a-1b。

⁹⁸ 徐象梅（明），《兩浙名賢錄》（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卷 54，頁 32b。

⁹⁹ 〈崇勳堂記〉，《夷白齋藁·外集》頁 38a；〈祭幹勒廉使文〉，《夷白齋藁》卷 35，頁 2b。

¹⁰⁰ 張昶（明），《吳中人物志》卷 4，〈薦舉〉，頁 6b。

5. 路過宦士

路過蘇州的宦宦，必定是當地士人結交的對象。例如，出生宣城世家的著名詩人貢師泰（1298—1362），泰定四年（1327）以國子生釋褐出仕，至正十年以翰林待制之職出使江南，次年還，經蘇州，當地君子士大夫（包括寓居者）莫不與之往來，同遊於蘇州山光水色之間。貢師泰於是請崑山朱德潤（1294—1365）繪〔遊虎丘圖〕，並以其題詩邀士人相和而得詩若干首，再請陳基為圖與詩寫序。¹⁰¹至正十四年，貢師泰除都水庸田使，再次來到蘇州，陳基獲觀其《友迂軒文集》，並為之序。¹⁰²

其實貢師泰與蘇州頗有關聯，因為至正十五年，元廷以「平江缺守，廷議難入」，命貢師泰為平江路總管，次年張士誠南下，師泰領兵作戰不敵，最後懷印綬棄城遁去，隱匿海濱之際。士誠既降，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睦爾又授師泰為兩浙都轉運鹽使，復除江浙行省參知政事。¹⁰³

又如張士堅，字師允，大名人，至正五年進士。至正十三年以戶部員外郎出使江西，道過蘇州，蘇州士人從之遊者冠蓋相望，賦詩相送，為序者也是陳基。¹⁰⁴

路經蘇州的貢師泰、張士堅，當地士人樂與之交往並賦詩而由陳基寫序，顯示陳基不但融入當地士人群體參與活動，且進一步成為蘇州士人的代表。

基本上，陳基與上述世族或士人的往來，建立於陳基所享有的文名之上，因此世家大族或士人活動，多邀請他題詩寫序。亦有如徐元震者，遣子弟從遊並提供住處。而這些當地的大族樂於與文士往來，常有宴會的舉辦，徐元震的「雅會堂」，顧進道的「綠陰亭」即其宴遊之所。¹⁰⁵不過最具規模的文士宴遊，當屬崑山大族顧瑛（1310—1369）的「玉山草堂」雅宴。

¹⁰¹ 〈遊虎丘圖詩序〉，《夷白齋藁》卷 13，頁 1a-1b。

¹⁰² 〈友迂軒文集序〉，《夷白齋藁》卷 18，頁 4a-5a。

¹⁰³ 《元史》卷 187，〈貢師泰〉，頁 4294-4296。

¹⁰⁴ 〈送張郎中詩序〉，《夷白齋藁》卷 16，頁 1a-2a。

¹⁰⁵ 〈綠陰亭記〉，《夷白齋藁·外集》，頁 32a。

（二）我愛玉山賓主賢——雅宴交遊

「玉山草堂」是元末東南最佳園林，也是民間最著名的文藝沙龍。¹⁰⁶創建者為顧瑛。顧瑛出身宦門，為崑山富豪，為人輕財好客。四十歲築「玉山草堂」：

園池、亭榭、餼館、聲伎之盛，甲於天下。四方名士……常主其家，日夜置酒賦詩。……一時風流文雅，著稱東南焉。¹⁰⁷

……四方之來與朝士之能為文詞者，凡過蘇必之焉。¹⁰⁸

其時天下名士多從之宴遊，顧瑛遂哀宴會所賦詩文為《玉山名勝集》，「元季知名之士列其間者，十之八九」。¹⁰⁹另外，顧瑛仿唐段成式（？—863）《漢上題襟集》與金元好問（1190—1257）《中州集》體例，編成《草堂雅集》，收錄陳基至釋自恢等七十人之詩。¹¹⁰由此可知陳基不但是玉山雅宴的座上嘉賓，《草堂雅集》的編排更將他列為第一人，黃潛尚在其次。以陳基所享文名，當之無愧。陳基並為《玉山名勝集》題序。¹¹¹

玉山草堂雅宴的時期，根據《玉山名勝集》所載，大約從至正八年開始。張士誠入吳之後，顧瑛自言「丙申歲，兵入草堂，奉母挈累寓吳興之商溪」，¹¹²「丙申」即至正十六年，因此玉山草堂應於至正十六年之後逐漸衰落。¹¹³陳基參與草堂雅集的時間，應是至正八年以後到至正十六年之間，所參加的聚會大致就是大型雅宴與小型會飲兩類。

¹⁰⁶ 關於顧瑛與玉山草堂，學者多有研究，請參閱么書儀，《元代文人心態》（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3），頁250-267；鈴木敬，《中國繪畫史》（東京：吉川弘文館，1989），卷中之二，頁181-194；David Sensabaugh, "Life at Jade Mountain: Note on the Life of the Man of Letters in Fourteenth-century Wu Society," 入《鈴木敬先生還曆紀念・中國繪畫史論集》（東京：吉川弘文館，1981）；Idem, "Guests at Jade Mountain: Aspects of Patronage in Fourteenth Century K'un-san," in *Artists and Patrons*, edited by Chu-tsing Li (Lawrence, 1989), pp.93-100。

¹⁰⁷ 顧嗣立（清），〈玉山主人顧瑛〉，《元詩選・初集》（下）（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2321。

¹⁰⁸ 李祁（元），〈序〉，《玉山名勝集》（四庫全書本），頁2b。

¹⁰⁹ 顧瑛（元），《玉山名勝集》，〈提要〉，頁1a-3a。

¹¹⁰ 顧瑛（元），《草堂雅集》（四庫全書本），〈提要〉，頁1a-1b。

¹¹¹ 陳基這篇序文收錄於四部叢刊本以及四庫全書本的《夷白齋藁》中。四庫全書本的《玉山名勝集》收有此序，作者則為黃潛。但此序並未收錄在黃潛四部叢刊本的《金華黃先生文集》中。有一種可能是此序乃陳基替黃潛所作。

¹¹² 顧瑛（元），〈金粟道人顧君墓誌銘〉，《玉山逸稿・附錄》（讀畫齋叢書本，叢書集成初編），頁77。

¹¹³ 其實至正十六年之後到張士誠亡之間，玉山草堂還是活動，只是方式上稍有不同，但盛況不再則是事實。見王忠閣，《元末吳中詩派論考》（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頁87-96。

大型雅宴，至正十一年八月五日陳基所記之情景：

余辱與鄭文學同夫遇于吳之隱君子顧仲英氏所。以仲英素多賓客，而同夫與余相值，未暇問姓字、邑里、行李所從來，輒舉酒為壽，獻酬襍還，亦不計年齒，貌蒼老坐上坐，飲酣鼓舞，各以所長自適。……¹¹⁴

這是一場賓客眾多的大型宴會，與會者不可能每人都相互熟識，但藉著酒酣耳熱的歡暢氣氛，陳基結識來自四方的文士。鄭同夫來自豫章（南昌），曾登范梈（1270—1330）、虞集、揭傒斯之門，也與陳基在大都的友人危素、揭傒、楊鑄、鄒魯望、張宣仲相識。如今陳基這群友人「相繼登臺閣」，唯獨陳基在野，卻能與顧瑛及其賓客笑傲草堂之上。¹¹⁵

至於小型會飲，陳基曾與鄭元祐、昂吉（唐兀氏，至正八年進士），同顧瑛在七月十六月圓時（年分不詳），晚酌草堂之中。當肴果美酒將盡，暑氣漸退而月出林間之際，顧瑛以「高秋爽氣相新鮮」分韻三人成詩，詩不成則各罰酒二觥，詩成則書之。¹¹⁶這是人數少，氣氛佳的聚會。此外，也有非飲酒的場合。例如至正十年十二月，積雪旬日，顧瑛邀請陳基與于立「煮茗於『雪巢』」，自是一番風雅。陳基有〈煮雪窩詩〉。¹¹⁷于立，南康廬山人，學道會稽山，遊寓吳中而與顧瑛友善。¹¹⁸

陳基還為玉山草堂各處「景點」題記賦詩，諸如，「小蓬萊」、「碧梧翠竹堂」、「湖光山色樓」、「聽雪齋」、「綠波亭」、「柳塘春」、「漁莊」、「春暉樓」、「釣月軒」等。¹¹⁹其中「湖光山色樓」藏三代漢唐禮樂之器，經史諸子百家之書；「春暉樓」則藏書法名畫。¹²⁰陳基與玉山草堂的互動，正如其詩所言「別墅新題人共賦，草堂高會世爭傳」，¹²¹十分貼切。

¹¹⁴ 〈送鄭同夫歸豫章分題詩序〉，《夷白齋藁》卷 14，頁 1a。此序亦見於《玉山名勝集》卷 4，頁 5a-6a。

¹¹⁵ 〈送鄭同夫歸豫章分題詩序〉，頁 1b。

¹¹⁶ 顧瑛（元），《玉山名勝集》卷 1，頁 17a-17b。

¹¹⁷ 顧瑛（元），《玉山名勝集》卷 5，頁 22a-22b。

¹¹⁸ 張昶（明），《吳中人物志》卷 10，〈流寓〉，頁 20a-20b。

¹¹⁹ 分見《玉山名勝集》卷 3，頁 7a、14b、31b；卷 5，頁 1a、27a；卷 6，頁 5b、17b；卷 7，頁 15a；卷 8，頁 3a。

¹²⁰ 張天英（元），〈湖光山色樓記〉，《玉山名勝集》卷 3，頁 28b；陳基，〈春暉樓記〉，《玉山名勝集》卷 7，頁 15a。

¹²¹ 顧瑛（元），《玉山名勝外集》（四庫全書本），頁 38b。

玉山草堂文士的詩文唱和，並不限於草堂之內：

所遊自崑山以外，如天平山、靈巖山、虎邱、西湖、吳江、錫山、上方山、觀音山，或有在數百里外者，……游非一人而瑛為之主，游非一地而往來聚會悉歸玉山堂也。每遊必有詩，每詩必有小序，以志歲月。¹²²

以顧瑛為首的文士出遊活動，最後仍回歸於玉山草堂。出遊的唱和詩，崑山袁華（1316—？）輯為《玉山紀遊》。參加出遊活動者，亦多為顧瑛草堂雅宴常見的座上嘉賓，陳基自然名列其中。

陳基出仕張吳政權，因職務之故，不再參與草堂雅宴，至正十六年（1356）後草堂雅宴逐漸式微也可能是原因之一。草堂盛會除了具有元代後期跨區域性的文士聚會的特色，也是陳基身為寓居士人與當地社會互動的一種形式。

（三）憂國腐儒頭欲白——家國關懷

陳基雖以寓居士人身分久居蘇州，其實已融入當地社會，因此對於當地的發展、安全相當關注。這種看法當然建立在以元為大一統的前提之下，尤其至正中葉之後「賊寇」四起，地方秩序安全的維護更顯重要。陳基只是一介寓居文士，並無實質力量從事建設或保衛地方的工作，但他以文字宣揚為政者的功績，從中央到地方，表現出陳基對於元政權的認同。這類文字出現在陳基出仕張吳政權之前甚多。

至正十三年，脫脫任丞相，陳基對於這位賢相的作為多所讚揚：

……方今聖天子紹隆丕基，賢宰相總文武大政，前年治河決，去年平徐寇，四方萬國日就底寧，今又除草萊、辟田野，崇本抑末，驅游食之民轉而歸之農，使各自食其力，變瀉鹵為稻粱，收干戈為耒耜，興富安長久之利，建萬世不拔之業。¹²³

脫脫是順帝在位時期非常重要的人物，¹²⁴至正元年與至正八年先後擔任中書右丞相。陳基所言「前年治河決，去年平徐寇」，指脫脫於至正十一年以賈魯為工

¹²² 袁華（元），《玉山紀遊》（四庫全書本），〈提要〉，頁 1a-1b。

¹²³ 〈送強彥栗北上詩序〉，《夷白齋藁》卷 15，頁 5a。

¹²⁴ 關於脫脫生平事蹟，參見《元史》卷 138，〈脫脫〉，頁 3341-3349。

部尚書治理黃河，歷八月工成。至正十二年，紅巾軍芝麻李據徐州，斬斷元廷南北運河交通命脈，脫脫率師親征徐州，城破賊平。至正十三年，脫脫用左丞烏古孫良楨、右丞悟良哈台之議屯田京畿，紓解海道運糧減少的問題，兩人兼大司農卿，給分司農司印，脫脫則領大司農事，因此西山、保定、河間、檀順之田「皆引水利，立法佃種，歲乃大稔」。¹²⁵

由於立分司農司，中書省臣提出「宜於江浙、淮東等處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一千名為農師，教民播種」，¹²⁶吳人強彥栗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召募入京，於是「吳大夫士與彥栗遊者爭為歌詩餞之」。陳基肯定當今賢相脫脫的作為與政策外，並以「此有志之士戮力就功名之秋」恭賀勉勵強彥栗。¹²⁷

派駐到蘇州有所作為的官員，陳基也為他們頌揚功績。至正九年，西夏人六十任平江路達魯花赤。六十，字子約，陳基有〈平江路達魯花赤西夏六十公紀績碑頌〉，宣揚六十到任蘇州的種種政績：整頓吏治、提倡文教，設法減免吳地的田賦。海運方面，海運之道從崑山劉家港入海，六十佈兵於此，防範海寇，使春夏兩次的糧運能順利抵達京師。至正十一年淮西賊亂起，攻陷長江兩岸諸郡，威脅浙西，六十親自參與蘇州的築城工作，兼制軍事，與士卒同勞苦，捍衛地方。¹²⁸

脫因，字明善，蒙古人，原為樞密院斷事官，至正十二年改任海道都漕運萬戶府達魯花赤。脫因專任海道，以軍法治漕事，講究效率，「兩漕賴之，卒皆以時達直沽」。至正十四年吳地饑荒，脫因發漕帑糴粟以賑災。至正十五年，拜為江浙行省參知政事。¹²⁹

六十和脫因除對蘇州有貢獻外，海運的維護乃重要政績。蘇州的重要在於：國家歲漕東南之粟，每春夏由吳門抵直沽以億萬計。¹³⁰糧運之數號稱「億萬計」，足以顯示蘇州的重要。但當時浙西與浙東的海道漕運分別受到張士誠與方國珍（1319—1374）兩大勢力的威脅與控制，即使後來兩

¹²⁵ 《元史》卷 138，〈脫脫〉，頁 3345-3346。

¹²⁶ 《元史》卷 43，〈順帝本紀〉，頁 908。

¹²⁷ 〈送強彥栗北上詩序〉，《夷白齋藁》卷 15，頁 5a。

¹²⁸ 〈平江路達魯花赤西夏六十公紀績碑頌〉，《夷白齋藁》卷 12，頁 1a-4b。

¹²⁹ 〈海道都漕運萬戶府達魯花赤脫因公紀績頌〉，《夷白齋藁》卷 12，頁 4b-7a。

¹³⁰ 〈送李德中序〉，《夷白齋藁》卷 17，頁 5b。

人皆降元，卻仍各自割據，所謂「及張士誠據有浙西，方國珍有浙東，而京師索然」。¹³¹方國珍從至正八年起事開始，屢叛屢降，據有台州、溫州、慶元諸郡，破壞元朝海運，威脅京師。至正十二年六十與脫因任內的海寇騷亂，正是方國珍所造成。張士誠降元之後，方國珍才一度接受元廷命令，負責運送由張士誠所徵集的糧食數十餘萬石至京師。¹³²所以六十與脫因在張、方兩大勢力未聽命元廷之前，致力海運暢通，使得糧食得以順利運往京師，對元廷十分重要。陳基當然視此為重要功績。

注重地方發展與風俗教化是地方官的基本責任，而吳地治理不易。例如，燕山邵侯知吳江州。陳基觀察，吳江多低地，重湖複陂，必須與水爭地利；且吳江又居水陸之咽喉，政經之樞紐，因此治理困難。邵侯就任後，以勸農桑為首要之務，接著「均賦役，勉學校，簡民訟」，一切施政按部就班，不本末倒置。等到南北徵兵，必須從蘇州調度糧食兵械，邵侯仍能使「民不廢畊桑，官不闕餽餉」。陳基認為，當時的聖君順帝與賢相脫脫，施政講求「綜核名實，厲精為治」，所以邵某在吳江任內的治績，足以符合中央政策的要求，而這也是邵某身為地方官的分內職責，對蘇州有所貢獻之處。¹³³

又如，崑山的城隍神祈雨相當靈驗，泰定元年（1324）達魯花赤道僧開始為之建廟。到了至正十年，崑山州守史元章欲重修城隍廟，大族顧瑛願從旁協助，擔負所有修廟經費。廟成之日，州人攜牲酒前來祭拜，一方面祝賀廟宇落成，一方面稱頌史元章的政績。州人以為，崑山並非蘇州地區中人口多、賦稅足之地，但位置瀕海，乃船隻往來列島的重要據點。史元章的施政，主要在整飭官署以護衛當地，復興學校以教化人民，儲備糧食以救濟飢困。所以陳基應州人之請而記之，並進一步表示，史元章的賢明同為崑山之人、神所依賴。¹³⁴

另外，陳基於至正二十四記錄重修常熟州廟學與吳縣縣學的經過。常熟州廟學自至元、皇慶以來，陸續有州人翻修。至正二十年，陳基之兄天台教授陳聚以一己之力修繕廟學毀損之處。二十二年，常熟知州盧鎮決心大加整頓。當

¹³¹ 任崇岳，《庚申外史箋證》（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卷下，頁102。

¹³² 《明史》卷123，〈方國珍〉，頁3697-3698。

¹³³ 〈送邵知州序〉，《夷白齋藁》卷16，頁2b-3a。

¹³⁴ 〈崑山州重建城隍廟記〉，《夷白齋藁》卷23，頁2b-4a。

時各地亂事已起，兵興民困，盧鎮身兼常州守禦元帥，以不擾民為原則，所有工程皆由軍伍完成。常州士民以盧鎮護衛地方同時，又能注重教化，有德於常州，特請陳基為文紀述。陳基稱盧鎮「於多事之秋，乃能不煩學官、不勤民力，親率師徒，致力於此，而完且速若是」，是正所當大書特書之處。¹³⁵

至於重修吳縣縣學，則由於縣尹楊彝「慨然以振興為己任」，首先邀請客居蘇州的吳興人莫孜（鄉貢進士），委以教官之職。然當時因逢世變而民罷於力役，楊彝在百廢待舉的情況下，導民以義，縣人遂起而響應。先有北宋范仲淹（989—1052）九世孫范廷珍等，捐錢五千緡為修學費用，接著吳縣嚴靈寺住持亦出資來助，使得修繕得以順利進行。迨竣工，楊彝致力宣導民眾前來就學，於是「口誦《詩》、《書》而身踐儒行者，相屬於道」。如此教化之風，使鄰州吳江奚士龍割私田九十畝捐為學田之用。所以，陳基稱讚楊彝，能於「百戰創痍之際」不廢文教，「正色一呼，應者如響」，不論「異端之徒」（嚴靈寺住持）、「鄰州之民」（吳江奚士龍），莫不共襄盛舉。這是禮義足以感人之處。¹³⁶

蘇州之外，陳基隨軍鎮杭州、淮安，對人文教化與傳承並不忽視。前面提及出鎮杭州之時，陳基建議張士德整修岳飛的墳墓與重刻西湖書院書目，陳基並寫有〈精忠廟碑〉、¹³⁷〈代弔岳飛文〉，¹³⁸及〈西湖書院書目序〉。¹³⁹在淮安，陳基曾出東門謁北宋徐積（1028—1103）之墓。徐積是楚州人，從胡瑗（993-1059）學，登治平四年（1067）進士，生平以孝為人所稱讚，死後賜諡「節孝處士」。與陳基同行謁墓的僚友，還有江浙行樞密院斷事官盛元輔、行樞密院都事湯鼎、江浙行省通事嘉世禮（西夏人）、掾史楊楫泊、淮南行中書照磨劉惟敬等人。陳基感慨由於戰亂，放眼所及皆殘阡敗冢，異常荒涼，而眾人只求能夠尋得這位「前代老儒先生」的丘墓所在並憑弔其風範，陳基遂有〈弔徐節孝先生文〉。¹⁴⁰

基本上，陳基對家國的關懷，上從中央的措施，下至地方的治理，顯示他以元朝為主體的態度。特別是蘇州地方的治理，從至正中葉兵興、戰亂不安的

¹³⁵ 〈常熟州修學記〉，《夷白齋藁·補遺》，頁 32b-33b。

¹³⁶ 〈吳縣修學記〉，《夷白齋藁·補遺》，頁 30b-32b。

¹³⁷ 〈精忠廟碑〉，《夷白齋藁》卷 33，頁 1a-3a。

¹³⁸ 〈代弔岳飛文〉，《夷白齋藁》卷 11，頁 6a-6a。

¹³⁹ 〈西湖書院書目序〉，《夷白齋藁》卷 21，頁 4a-6b。

¹⁴⁰ 〈弔徐節孝先生序〉、〈弔徐節孝先生文〉，《夷白齋藁》卷 21，頁 6a-6b、卷 11，頁 6b-7a。

情況下，地方官員一方面既能保衛地方，一方面又能不擾民，不中斷教化責任，甚至加以整頓推行，這些都是必須稱揚的善政。或者該說，是元朝的善政，而非張吳政權下的政績。

（四）白首輕拋種樹書——志向抱負

陳基仕元爲經筵檢討，因得罪順帝不得不辭官退隱；出仕張吳則由於受到張士誠的重用，相較之下更有所發揮。當時同入張吳幕府的陳基及其同僚，以張士誠肩負重任，值得輔佐：

公（張士誠）方合四方俊英瓌傑之士，率貔虎驍悍梟雄之將，苦心勞思，誓先天下，為社稷生民剷除禍孽，非細務也。¹⁴¹

這段文字寫於至正二十一年，張士誠名義上仍是元朝的僚屬。陳基認爲張士誠奉元正朔與他們輔佐張吳的意義、關係相同，他說：

蓋公之奉國，與吾等事公，以勢分言，則子弟之於父兄也；以休戚言，則心腹肘腋，眾竅百骸，無一非要害者。¹⁴²

而且幕府的重要，「凡文武百度，鉅細緩急，幕府莫不預聞而畫諾焉」，所以陳基與同僚對張士誠的效力「同心榮瘁，死生以之，自信不疑，非一朝夕」，「黽俛鞠躬，夜以繼旦」。這裡所說的同僚，包括行中書員外郎錢用壬（至正十四年進士）、行樞密院都事盛元甫、蔡彥文。陳基說他們四人戮力於政事，其論議趨捨、舉措謀爲，「不苟同以徇勢，不求異以徼名」。¹⁴³可見出仕張吳的確是讓陳基能夠一展抱負的場域。

而當士人施展抱負過程中，其職責何在？陳基觀點如下：

夫士之為事也，孰有大於事君者乎？其所思也，孰有先於君之事乎？思者何思？所以獻其可而替其否也。君好賢，吾思進之，惟恐其或不先也。君好佞，吾思遠之，惟恐其或後也。君惡諫，吾思犯之，惟恐其或隱也。

¹⁴¹ 〈贈盛斷事詩序〉，《夷白齋藁·補遺》頁25a。

¹⁴² 〈贈盛斷事詩序〉，頁25a-25b。

¹⁴³ 〈贈盛斷事詩序〉，頁2b、25a。

君喜讒，吾思去之，惟恐其或弗亟也。充此類也，亦可謂盡忠矣。¹⁴⁴

陳基認為士人最重要的事莫過於事君，所思之事當以君主為優先。這裡的「君」指「在上位者」。根據在上位者的好惡以調整士人的進退，而且一切考量必須以有益於在上位者為前提，此即所謂「盡忠」。但盡忠之道不僅於此，士人必須進一步思考「所進」、「所遠」、「所犯」、「所去」的內容是否確切、行為是否得體。這種「事君」的態度，則從師法古人得來，即「拊躬自訟而已」。¹⁴⁵

其實陳基以上觀點，發揮自他為蔡彥文「退思齋」所寫的記，時間在至正二十年。前文提及蔡彥文、葉德新、黃敬夫是張士誠身邊的主要謀國幕僚，當時人認為：

三人皆書生，迂闊不知大計，然皆優於文學，與楊鐵崖（楊維禎）、陳敬初（陳基）等時相唱和。¹⁴⁶

蔡、葉二人被楊維禎稱為「二佞」，一個是「山陰蔡藥師」，一個是「雲陽葉星卜」，「朝坐白玉堂，暮宿黃金屋」，張士誠的亡國與他們息息相關，甚至朱元璋聽說張士誠重用王、蔡、葉三人謀國，也不禁要大大搖頭。¹⁴⁷陳基留下的詩文中，確實與蔡、葉二人有所唱和，但不見和王敬夫的往來，且詩文中並未出現對蔡、葉的鄙視，卻是諸多勉勵與表彰其正面形象。例如陳基稱蔡彥文：

經儒緯律，師古不少懈，敏事力行，未嘗擇利害，及退而思之，則又未嘗不拊躬自訟者，其自刻勤篤概如此。¹⁴⁸

蔡彥文任職江浙行省樞密院都事三十餘年，以「材謂賢勞」著稱，至正二十年已經五十餘歲。陳基眼中的蔡彥文與「迂闊」、「佞」似乎沒有關聯，反而其「拊躬自訟」成為陳基所謂士人盡忠的根源。

陳基對葉德新亦多所肯定。至正二十二年葉德新擢昇為江浙行省照磨，陳基寫下〈原器贈葉照磨德新〉，提到人才與用人，說道：

天下之器有大小，而其為制有程度。……人之為人也，不一其材，而國之用材也，不一其能。視其長短大小，旁羅而並蓄之，使職其職者，各

¹⁴⁴ 〈退思齋記〉，《夷白齋藁》卷 31，頁 1b。

¹⁴⁵ 〈退思齋記〉，《夷白齋藁》卷 31，頁 1b。

¹⁴⁶ 支偉成、任致遠，《吳王張士誠載記》卷 3，頁 12a。

¹⁴⁷ 錢謙益（明），〈周張士誠〉，《國初群雄事略》卷 7，頁 184。

¹⁴⁸ 〈退思齋記〉，《夷白齋藁》卷 31，頁 1a。

盡其力而責其成，善制國者也。吾為天下誦斯言久矣。……¹⁴⁹

「人之為人也，不一其材」即「用人以器」之意。國家用人，必須用各種不同才能的人，使能各司其職。陳基認為葉德新是一個有才能的人，其學識「以六藝百家自緣飾」，曾於甌越地區輔佐郡官治獄，活不當死者數百人，受到甌越人民的稱讚。迨入張士誠幕，更是克盡職責，陳基說：

德新出則操章程、參紀律，從將相征討，不廷，雖犯霜露、冒矢石不避。
入則與郎吏百執事進退廟堂，鞠躬盡瘁，務是是非非以忠所事，俯仰六、
七年如一日，未嘗以利害為趨捨。……¹⁵⁰

因此陳基稱讚葉德新乃「有用之器」，擔任照磨之職更能夠「以其所抱負，從容於其規矩」。

陳基對蔡、葉二人的評價不差，呈現出與一般認定「二佞」的不同形象。評價有所不同，應非陳基識人不清，否則陳基豈不同樣「迂闊」與「佞」，必然也會受到時人的批判。推測原因，可能是陳基與蔡、葉同入張吳政權，有同僚之誼，對他們的認識也比外界來的深刻，所以除了缺點，二人仍有可取之處，正如陳基所言「國之用材，不一其能」，「使職其職者，各盡其力而責其成」，與其嚴厲批判其缺失，陳基採取的是表彰勉勵的態度。此外，蔡、葉二人「優於文學」，能與陳基詩文唱和，文士交誼性質亦頗濃厚，或者這也是陳基不願批評的原因。這點與楊維禎很不相同。

陳基表彰勉勵蔡、葉二人，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雖同入幕府，但陳基受到重用之處不一定如其所願，可能多少也反映出陳基志向無法全然施展的遺憾，而期望蔡彥文等「實際的謀國者」能好好發揮輔佐的作用。他曾言：

君子之為僚吏，得賢公卿而事之，則政斯舉矣。¹⁵¹

士人輔佐賢明的上位者，必能使政事有所作為。張士誠禮下賢士的態度在陳基標準中應算「賢明」，不過他受到的「重用」卻與黃蔡葉三人不同，後者重在「謀國」。陳基畢竟以出仕為伸展士人抱負的終極志向，他雖然因為得罪順帝不得不退隱，但仍北上大都尋求再次入仕的機會；對於能夠前往大都的士人（例如強

¹⁴⁹ 〈原器贈葉照磨德新〉，《夷白齋藁》卷12，頁10b-11b。

¹⁵⁰ 〈原器贈葉照磨德新〉，《夷白齋藁》卷12，頁11a。

¹⁵¹ 〈送陳景初序〉，《夷白齋藁》卷19，頁1a。

彥栗、王昉）則予以非常的期許勉勵。當陳基有機會再度一展抱負，卻已白首中年，入仕於表面奉元實則獨立的張吳政權而無法完全施展其志，或者這就是陳基願意表彰嘉勉蔡彥文、葉德新，希望他們發揮士人職志的原因。

四、結論

「吳下衣冠盡楚材，隴西勳業冠雲臺」，這是陳基〈送劉郎中〉的詩句，¹⁵²而以「吳下衣冠盡楚材」來形容陳基本人，卻也十分貼切。陳基年少即離開台州臨海故鄉，遊學杭州、仕宦大都，最後長期寓居蘇州。整體來說，陳基一生經歷了三個政權，但其文才學識最有所發揮貢獻的時期，則是在他寓居蘇州，不論文壇或政壇，皆享有一定的盛名與地位，實為「台材吳用」。


對政權的選擇，陳基是忠於元朝的。雖然在張士誠入平江而尚未降元的短暫一年之中，陳基因張士德之故接受延攬，他對元朝的忠誠必然受到質疑，但所幸張士誠隨即降元，因此陳基出仕張吳等於出仕元朝，解消原本可能存在的忠誠問題。陳基自認為元朝官員而非僅止於張吳官員，他對張吳政權的認同，主要建立在張吳願意尊奉元朝正朔的基礎之上，也因此陳基並不支持張士誠自立為王。可是另一方面，張吳對陳基的「重用」與陳基本人的預期其實有所落差，出仕張吳的過程中，陳基漸露後悔心態，卻又無法斷然去職。至於明朝政權，入明之前，陳基對朱元璋全然是賊寇之流的負面評價。入明之後，朱元璋不殺陳基，主要原因是陳基的學識品德受到眾人肯定。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未嘗不是反映出陳基在張吳政權中並非重要核心幕僚的事實（例如與王、蔡、葉三人比較），所以連同其學識品德等因素，不至構成必然被殺的理由。陳基參與編修《元史》並不等於認同朱明，沒有任何資料顯示他對朱明的看法。當時不僅張吳滅亡，元朝更是大勢已去，多言無益，非一人可挽狂瀾，於是陳基修史完畢隨即還鄉，或許這是他最後僅能呈現的選擇。

身為一位寓居者，陳基已完全融入蘇州士人群體之中，藉由與當地士人的互動而與蘇州社會產生緊密聯繫。陳基一生當中，最愜意的時期應是他寓居蘇

¹⁵² 〈送劉郎中〉，《夷白齋藁·補遺》，頁 10b。

州到張吳政權建立前的這十幾年。這段時期，陳基不僅與當地士人（漢族與非漢族）、世族結交，參與雅宴活動而受到推崇，同時也與派駐及路過蘇州的官宦形成有意義的聯繫，這種意義產生於以元朝為主體架構之下，反映出他對蘇州地方的關懷及對元朝的忠誠。可以說，在陳基的記憶裡，由「聖君賢相」順帝與脫脫治理的盛世，即是他寓居蘇州的這段時光。

因為寓居蘇州，使陳基有再度入仕的機會，一償所願（他一直想回到大都謀官）。只不過入仕張吳政權，生活卻發生變化，無法像過去般愜意悠然，取而代之的是戰亂不安的心情與軍旅的流離顛沛，「世亂難為別，他鄉復暮秋」是陳基這段時期的心情寫照。¹⁵³不過即使如此，陳基仍秉持士人職志所在，為所當為，雖然入仕不全然如願，他仍寄望於同僚能有所發揮。

縱觀元代，蘇州寓居士人不在少數，陳基僅為其一。然透過個案考察，可以瞭解寓居者如何與當地社會互動，而互動過程中，顯現寓居者與當地社會的彼此認同，以至政權認同的時代意義。陳基個案可為參考之例。

¹⁵³ 〈送姪讓從軍武安〉，《夷白齋藁》卷6，頁5a

參考書目

古籍或專書：

1.史料

- 朱長文（宋），《吳郡圖經續記》，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
- 陳 基（元），《夷白齋藁》，四部叢刊本。
- 倪 瓚（元），《清閬閣全集》，元代珍本文集彙刊，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70。
- 楊維禎（元），《楊維禎詩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
- 鄭元祐（元），《僑吳集》元代珍本文集彙刊，台北：中央國立圖書館，1970。
- 顧 瑛（元），《玉山名勝集》，四庫全書本。
- 顧 瑛（元），《草堂雅集》，四庫全書本。
- 顧 瑛（元），《玉山逸稿》讀畫齋叢書本，叢書集成初編。
- 顧 瑛（元），《玉山名勝外集》，四庫全書本。
- 袁 華（元），《玉山紀遊》，四庫全書本。
- 宋 濂（明），《元史》，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76。
- 張 昶（明），《吳中人物志》，明隆慶刻本，續修四庫全書。
- 錢謙益（明），《國初群雄事略》，明代傳記叢刊，台北：明文書局，1991。
- 徐象梅（明），《兩浙名賢錄》，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
- 李銘皖等修、馮桂芬等纂（清），《蘇州府志》，光緒九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
- 張廷玉（清），《明史》，點校本，台北：鼎文書局，1982。
- 顧嗣立（清），《元詩選·初集》（下），北京：中華書局，2002。
- 支偉成、任致遠，《吳王張士誠載記》，上海：大中書局，1932

2.專書

- Herbert Franke and Denis Twitchett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6, 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 907-136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中譯本，史衛民等譯，《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 王忠閣，《元末吳中詩派論考》，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
- 汪柏年，《元明之際江南的隱逸士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1996。
- 周良霄，《元代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 徐永明，《元代至明初婺州作家群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 陳得芝，《蒙元史研究叢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 陳建華，《中國江浙地區十四世紀至十七世紀社會意識與文學》，上海：學林出版社，1992。
- 廖懿姿，《元末張士誠政權與淮東、浙西社會》，國立清華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2003。
- 蕭啓慶，《元朝史新論》，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
- 錢 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六），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5。

論文：

- Marmé, Michael. "Heaven on Earth: The Rise of Suzhou, 1127-1550." in Linda Cooke Johnson ed. *Cities of Jiangna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pp.17-30. 中譯本見成一農譯，《帝國晚期的江南城市》（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頁 21-39。
- 丁崑健，〈從仕宦途徑看元代的遊士之風〉，收入蕭啓慶編，《蒙元的歷史與文化》，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1）（下），頁 635-653。
- 林麗月，〈讀《海桑集》——論元明之際陳謨（1305-1400）的出處及其後世評價〉，《世變、群體與個人——第一屆全國歷史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1996，頁 148-166。
- 姚大力，〈元朝科舉制度的行廢及其社會背景〉，《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 6 期，1982，頁 29-59。
- 梁庚堯，〈宋元時代的蘇州〉，收入氏著《宋代社會經濟史論集》（上），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頁 334-480。
- 勞延煊，〈元明之際詩中的評論〉，收入《陶希聖先生八秩榮慶論文集》（台北：食貨出版社，1979），頁 145-163。
- 劉祥光，〈從徽州文人的隱與仕看元末明初的忠節與隱逸〉，《大陸雜誌》94 卷 1

期，1997，頁 32-48。

鄭克晟，〈試論元末明初江南士人之境遇〉，收入氏著《明清史探實》（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頁 7-33。

蕭啓慶，〈元明之際士人的多元政治抉擇——以各族進士爲中心〉，《台大歷史學報》第 32 期，2003，頁 77-138。

Chen Ji : A Sojourner in Su-zhou during Yuan Dynasty

Hsu, Shou-Min^{*}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to discuss the sojourner (流寓) Chen Ji's (陳基) political, sociological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during his stay in Su-zhou (蘇州). Su-zhou, also known as Ping-jiang route (平江路) in Yuan Dynasty, was a better place for people to live before turmoil got everywhere at the end of Yuan.

Taking refuge was not the prime reason for Chen Ji to stay in Su-zhou, however, his stay in Su-zhou encountered three political changes from Mongol-Yuan (蒙元), Zhang-Wu (張吳) to Zhu-Ming (朱明).

By understanding his lifetim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how Chen Ji joined and contributed to local society when he stayed in Su-zhou. It also explains why Chen Ji recognized Yuan as legitimacy and supported the Zhang-Wu regime that made him reject the Zhu-Ming regime. It is no concern of Mongol rule that Chen Ji recognized Yuan as legitimacy. And the reasons he supported Zhang-Wu were because the Zhang-Wu regime not only recognized Yuan as legitimacy but also kept Su-zhou safe and respected the literati.

The case study of Chen Ji can provide a commentary to the literati in Jiang-nan (江南) area choosing political ruling throughout Yuan-Ming transition.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Keywords:

Yuan Dynasty; Su-zhou; Chen Ji; sojourner; Zhang-Wu regime

